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石坚平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 石坚平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113-1401-7

I. ①良… II. ①石… III. ①移民-历史-江门市-宋代-学术会议-文集 ②移民-历史-南雄市-宋代-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5430 号

●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主 编 / 石坚平
 责任编辑 / 王 晖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大 32 开 印张 13.625 字数 / 35 万
 印 刷 /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401-7
 定 价 / 42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64443056 传真: (010)64439708

发行部: (010)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序

徐伟

蓬江, 这片侨乡热土, 在历史的时间长河中, 蕴育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拓殖和开发浪潮中, 一批批先民来到这里围海造田、建造围堤, 改良土壤, 将这片土地由山海之区, 改造成为鱼米之乡。蓬江先民们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 也创造出璀璨的精神文明成果。

随着时光岁月的流逝, 许多尘封的历史记忆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失去昔日的光华。位于今天的蓬江区棠下镇的良溪古村, 就是这样一个个被岁月尘封起来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青山翠绿的掩映之下, 巍峨矗立的罗氏大宗祠、森严肃穆的五部堂、气势恢宏的罗贵墓, 无不在默默地诉说着先民们移民拓殖的故事, 承载着地方的文脉, 延续着历史的记忆。

近年来, 区委、区政府和国内外专家学者、民间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使良溪古村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逐渐走入公众的视线, 日益成为发掘地方文化, 服务蓬江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典范。



目录

序	徐伟 (1)
第一部分：“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研讨会论文集辑	
珠玑移民故事的演变与良溪的“圣地化”	石坚平 (3)
南雄珠玑巷与集体记忆的缺失	王元林 (22)
进入政府视野的良溪古村与家族文化	张国雄 (31)
良溪村史——兼论清代华南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 ...	王传武 (41)
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珠玑移民”	仲红卫 (58)
珠玑移民融入岭南社会的方式探析	邢照华 (75)
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珠玑巷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开发	宋永志 (86)
珠玑移民认同与明中后期南海土人集团的教化运动	邓智华 (98)
清末民初对珠玑巷移民的解读：基于旧志考察	
.....	刘正刚 刘贝贝 (109)
从历史地名学视角看珠玑巷移民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	
.....	吴宏岐 王荣 (126)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宋代珠江三角洲移民与农业科技传播 ... 吴建新 袁海燕 (147)

道光《新会县志·图说》姓氏分布研究 ... 郭声波 刘兴亮 (167)

开发珠三角的珠玑移民分布与数量探研 ... 宋会群 (184)

盐民与移民: 宋元以降香山盐场社会变迁探略 ... 段雪玉 (198)

明代士绅与宗族建构——以番禺珠玑后裔大岭陈氏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 朱光文 (223)

西江中游的珠玑巷故事与地方社会变迁 ... 唐晓涛 (259)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例 ... 肖文萍 (272)

第二部分: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资料选辑

一、良溪古村文献资料选辑

(一)《良溪北坎叶氏家谱》中的文献资料选编 ... (319)

(二)良溪罗氏家藏的文献资料选编 ... (321)

二、珠玑移民文献资料选辑

(一)道光二年《白沙陈文恭公房谱》资料选辑 ... (334)

(二)光绪六年《南庄南浦祖东潮祖罗氏族谱》资料选辑 ... (335)

(三)光绪十八年《陈氏族谱》资料选辑 ... (341)

(四)光绪二十四年《砚洲罗氏家谱》资料选辑 ... (341)

(五)光绪二十六年《宁阳杂存》资料选辑 ... (342)

(六)光绪二十八年《麦氏宗谱》资料选辑 ... (343)

(七)民国二十八年《新会紫泥房叶氏族谱》资料选辑 ... (346)

(八)民国三十八年《新会潮连芦鞭卢氏族谱》资料选辑 ... (347)

(九)1988年《始平郡世系》资料选辑 ... (355)

(十)《南庄紫洞光之最公世系》资料选辑 ... (357)

第三部分: 公众媒体有关良溪古村研究和开发的报道

一、全力打造“良溪文化工程”的建议

江门市蓬江区政协网 2009年7月14日 ... (361)

二、良溪柑普茶享誉江门茶业

《珠江环境报》2009年9月30日 ... (364)

三、江门古迹: 良溪村

五邑华侨博物馆网 2009年12月21日 ... (364)

四、良溪欲做国字号名村

《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18日 ... (366)

五、第二批省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良溪村成“状元”

《江门日报》2010年1月26日 ... (370)

六、长堤短语: 良溪村的保护需小心谨慎

《江门日报》2010年1月29日 ... (370)

七、市长王南健一行到良溪古村参观调研: 保护好, 规划好, 才能建设好

《江门日报》2010年2月9日 ... (372)

八、探访古旧建筑 挖掘人文历史: 省媒访古首站选良溪

《江门日报》2010年6月15日 ... (373)

九、2010年蓬江区良溪文化古村歌曲创作征集评选活动

江门市蓬江区政务网 2010年7月2日 ... (374)

十、“后珠玑巷”——良溪古村

广东文化网 2010年6月29日 ... (376)

十一、深挖内涵打造品牌 江门市良溪村成“寻根”景点

中国新闻网 2010年7月9日 ... (378)

十二、雷于蓝对话黄伟宗: 学习别处的先贤重要, 挖掘广东先贤更重要

南方日报网络版 2010年7月15日 ... (380)



族事务决定权，被侨居在外者所控制。百侯侨乡建构的个案，对于认识和理解客家传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近代 客家 侨乡 建构 大埔县百侯村

一、引言

粤东韩江流域的潮梅各县，是华南地区侨属的主要分布地区，与五邑地区一样，向以“华侨之乡”著称。对于华侨的产生及其对侨居地和原乡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前辈和时贤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华侨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纵观各项成果，也仅限于资料和研究对象，或者限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分类，往往有就华侨论华侨之嫌，而没有注意到当时迁居者本身可能并没有国界的政治概念，而只有村内村外的地理概念。因而对于乡村居民而言，居于外地之村民，不论居于国内还是国外，均为侨居者。而侨居于外者，不论居于国内还是国外，对于原籍的认同都是一致的，因而也是紧密相联的。因此对于侨乡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侨居于国外的华侨部分，而且还要关注侨居于国内的部分，并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够真正理解侨乡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获得关于侨乡社会的总体认识。

百侯村位于粤东大埔县东南山区的一个由韩江支流梅潭河冲积而成的小盆地，是粤东地区著名的“侨乡”。近年来笔者多次到这一村落进行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族谱、个人文集等民间文献，其中不少材料记载了从清末到民国期间，侨居于外的村民与原乡之间在处理乡村事务过程中频繁的互动关系。本文以百侯村作为个案，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试对这个村落在近代侨乡社会的形成和建构过程进行分析和探讨，以加深对客家山区侨乡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百侯村距新县城^①湖寮10公里，距老县城茶阳40公里，

[1]大埔县城在嘉靖五年建县时设在茶阳镇，1961年迁湖寮镇。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以大埔县百侯村为例

肖文评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提 要：随着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乾隆以来，尤其是道光年间沿海开埠以后，粤东客家山区居民到东南亚等地创业，成为向外移民的新趋势。本文根据田野调查和所收集的各种官方与民间文献，以典型侨乡粤东大埔县百侯村为个案，探讨客家侨乡的形成与建构过程。人多地少，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是移民的基本因素，而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出外创业者的主动性选择。至清末民初，全村出外谋生者占总人口的1/3，上海、南京等地被村民视为“北洋”，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被称为“南洋”，数十名“水客”往来其间，百侯成为远近闻名的侨乡。村人倚南洋为“外府”，不仅侨资成为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且侨居者成为建构家乡的决定性力量。他们不仅在家乡建洋房，而且捐资在家乡举办新式教育，编修族谱，重印祖先文献，重塑“文化之乡”，建构起“侨乡”的社会形象。家乡的政治、经济、教育、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距潮州约180公里,距汕头约230公里。居民有杨、肖、丘、池等30多姓,一万四千多人,其中杨姓六千多人,肖姓五千多人,丘姓六百多人。清初以来百侯文化发达,至清末共考中进士19人、举人104人,均超过全县总数的40%,有“一腹三翰院”、“同榜三进士”、“同榜七举人”的美誉。^[1]清末民初又率先办起了小学、中学,文化教育水平高,成为粤东著名的“文化之乡”。同时也是典型的“华侨之乡”^[2],村民很早就有出外谋生的习俗。全村现居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华侨达3万多人,超过家乡人口两倍以上。居于广州、汕头、深圳等地者1万余人。

二、侨乡社会的形成

乾嘉以来,随着大埔人口的繁衍和工商业的发展,外出谋生者众,先是侨居于苏、杭等地,随着沿海的开埠和出洋的开禁,移民出现新动向,主要侨居于上海、新加坡等地。

大埔地区侨居南洋者,较早者为乾隆十年(1745年)的张理和丘兆和。他们和福建永定马春福等,侨居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因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伯公”,现已成为南洋华侨聚居区的重要信仰之一。^[3]影响较大者还有百侯人肖贤舞。他于道光年间率同乡来到新加坡,开辟荒岛,并于咸丰八年(1858年)创立新加坡茶阳会馆,为乡人出洋和侨居提供了便利。^[4]

[1] 参见拙文《从“贼巢”到“邹鲁乡”：清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墩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 广东省《梅州市华侨志》编委会、广东省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梅州市华侨志》，2001年，第118页。

[3] 肖国祥：《檳城散记》，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8年，第56页。

[4] 新加坡茶阳会馆：《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四十年周年纪念特刊》，第139页。

(一) 侨乡社会的形成

百侯自清初以来虽然科举兴盛，文化发达，出外为官者众多，但是人口发展太快，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杨氏宗族在清初时才数百丁，但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时已发展到“男丁千余”，^[1]到康熙五十五年时竟达“丁二千有余”。^[2]肖姓人口也发展到两千多人。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百侯杨氏“繁衍迁以来迄于今，兹鼎经四移，年逾五百，世则二十有丁则七千有余，此皆就地而言”。^[3]仅杨氏一族，就达七千余人。整个百侯盆地，则在一万三千人以上。

百侯山多田少，人多地少，百侯盆地及周边山区的开发已基本达到极限，土地所出，不足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百侯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为维持生计，因而形成“走川生”的习俗。正如嘉庆九年《大埔县志》所称：“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资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4]

从乾嘉以来，百侯村人开始大批出外谋生，先是集中在潮州、苏州、杭州等地，道光以后集中在上海、汕头和南洋。至清朝末年，百侯“环近四周之赴南洋诸岛，以及苏、沪、汉各处谋生者，计不下一二万人”。^[5]到民国时期，村民已“络绎于南洋群岛矣”。^[6]

民国时期，百侯人“少数业农，多出上海、南洋各地谋生”。

[1] 杨之徐：《编年录》上册，1924年，第132页。

[2] 杨之徐：《编年录》下册，1924年，第29页。

[3] 杨光辅：《归善德化桥杨氏归宗序》，《归善德化桥杨氏族谱》，道光二十三年三月。

[4] 嘉庆九年《大埔县志》卷11，第4页。

[5] 无名氏：《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白侯》，《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6]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3，1943年，第7页。

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外出谋生为主的外向性经济成为当地社会的主要特色。据1929年统计,百侯全村共14884人,而出外谋生者达4014人。^[1]县中到南洋谋生者,据估计在2500人以上,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南洋。

据调查,清末民初的百侯,有崇尚出外谋生的习俗,认为只有在外面谋到生活之资才算本领,才有地位。不出门而家庭经济又困难者,不但被人看不起,而且也会被村中“老大”“挤”出去。当时到南洋的交通条件虽已改善,但毕竟远隔重洋,风险很大,人生地不熟。因此村中有能力、有条件者多在上海、广州谋生,稍逊者在汕头、潮州及家乡谋生,实在没有办法的,才出南洋谋生。正如一些侨居于外者所寄侨批中多次所提到:“男在外,远离膝下,为娘谋食起见,实非得已。”“男在外,因为谋食远游。”^[2]等等。因此,到南洋谋生者主要是中下等家庭。很多家庭四五兄弟只留一人在家看护家园,其他都侨居到南洋或国内其他地方去了,从而出现“一子顶江山”的奇特现象。他们的家属,尤其是年老的父母,多在家乡。自己年老体衰,也多叶落归根,回家养老。他们所赚的血汗钱,多由水客带回赡养家小。而整个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外谋生和发展,1/3以上的家庭不会种地,也不做其他营生,完全靠侨居于外者寄钱接济,从而成为粤东地区典型的“侨乡”。

位于村口由百侯过高陂的凉亭亦乐亭,是村人送别外出谋生者的地方。民国初年村中秀才杨梅湖过南洋,在此题联曰:“此地一为别,天涯万里人。”这一联对,成为“侨乡”的显形标志。

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据县志记

[1]温廷敬:《大埔县志》卷3,1943年,第21页。

[2]民国24年五月十九日、民国25年十月二十日马南半岛新山肖娘才给母罗氏的批信。

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薪补救。未及成童,既(即)为游子,比比皆是”,以至“侨外人数,几不亚于在乡”。^[1]

(二) 侨乡形成的社会性因素

首先是谋生的需要。

与整个粤东客家山区一样,百侯村落人多地少,欲耕无田,欲工无门,欲商无钱^[2],这些因素促使百侯人为了谋生而向外发展。

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是导致百侯人大规模出外谋生的主要因素。村民出外谋生的高峰是遭受严重灾难,如水、旱灾或战乱。山区的自然环境恶劣,山多田少,严重的水旱灾难一旦发生,原本脆弱的经济就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生活难以继,只好离家出外谋生。如道光十三年(癸巳)五月二十七日,大埔东南部地区大雨如注,至夜间平地积水。“百侯一乡,顷刻成巨浸。天未明,淹没大土楼三座,铺户百余间,大小房屋无数,溺斃男妇二百余人。”“河岸村落,屋宇人畜,尽为洪流所侵袭,实奇灾也。”村民俗称为“癸巳大水”。相传在这次大水中,杨姓房屋冲塌一半以上,地势较低的池姓所居房屋全部被淹没,居民被淹死一半以上。大水过后物价又飞涨,“时米价腾贵,一斗钱千余”。^[3]遭此大难后,幸存者为了生存,纷纷随人出外谋生。如池姓,相传原有一千多丁,被大水淹死了一半,幸存者中又有一半出外谋生了,因此在家乡居住者很少,池姓因此由村中的大姓变成了小姓。

[1]温廷敬:《大埔县志》卷11,《民生志·殖外》,1943年,第1页。

[2]罗英祥:《浅谈梅县的过番歌谣》,广东侨史学会《侨史学报》,1988年,第2期。

[3]温廷敬:《大埔县志》卷36,1943年,第9页。

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年），太平天国余部几次进出百侯。“甲子秋九月十四日午时，太平军人境，村人被杀虏者二百余人。”“乙丑春二月十二，太平军复来（百侯）。”“五月五日午时，太平军复来（百侯）。”^[1]百侯绅耆“邱春梧、杨丹凤、杨禹甸、杨汝为、杨继麟、肖惟森等，俱以骂贼惨死”。^[2]人口被虏被杀，财物被抢，房屋被烧，至今还流传着7个祠堂被烧的传说。村民为躲“长毛”，纷纷外出潮州、广州，不少去了南洋。

与其他深山地相比，百侯的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在过去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情况下，河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百侯位于韩江三大支流之一的梅潭河边，东溯梅潭河可至福建平和、漳州到厦门出海口，西下梅潭河可至三河、潮州、汕头出海口，南走陆路到高陂下韩江。历史上，韩江是一条黄金水上通道，几乎是粤东地区人们出海的唯一途径。百侯位于这条重要航线的主要支干上，为百侯人出外过番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百侯成为著名侨乡在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上的优势。

再看外部环境。19世纪初，英、荷等殖民者加快了对南洋的开发，需要大量工人。随着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特别是1861年汕头的“开埠”，为因生活所迫而想出国的粤东人提供了可能条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增大，不少百侯人在这种移民浪潮的影响下，背井离乡，远赴重洋。百侯人出南洋原是走陆路，经饶平到樟林港，坐“大眼船”出南洋，一路相当辛苦。汕头开埠后，村民即改走高陂，从韩江水路到汕头，再乘轮船到南洋各地，时间缩短，安全性提高，因此出洋者更多。

其次是风气驱使的结果。

[1]百侯杨氏：《继志堂》编委会：《继志堂》，2003年，第6页。

[2]温廷敬：《大埔县志》卷36，1943年，第11页。

客家人极重宗族和乡土观念，一旦本族或本村有人出南洋并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立稳脚跟，便会介绍国内亲友、同宗、同村人出洋，或跟随自己在工矿做工，或做自己店里的帮手，或代为介绍另谋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祖籍广东大埔县西河乡的印尼华侨富商张弼士，他在印尼领到了许多荒田以及所需的资金、工具、种子等，人手不够，于是他“一面请当地的华工帮忙，一面写信回家叫乡人多多前来。乡人以其在海外大有作为，皆争先前往投之”。^[1]在此裙带关系的影响下，过番出洋逐渐成为一股风气，有时甚至一个村子或一个宗族的大部分男人都跟随出去，而且很可能与引介人都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地区。

例如1920年代侨居新加坡等地的杨慰然在《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中说：“我们的原籍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偏僻山区，居民在民初时期海禁已开，分向南北找寻生活。……后继的人是全靠先到者的照顾与提携的。这些照顾后进的先贤，多得数不清的。”^[2]

因此清末民初百侯男子一到十多岁就出洋，慢慢形成一种“男的一长大就要到外面挣钱谋生”的风气。

再次是发展的需要。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东南沿海的开埠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南洋地区的开拓，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机遇。因此乡人在家接受基本教育后，纷纷出门闯天下。如1893年出生的杨富臣，11岁即到上海闯世界。他一边继续自学，一边当店员，学习经营商业，加上在上海经商的乡亲帮助，很快熟悉了商场业务。他锐意进取，出奇制胜，20多岁就成为上海

[1]祝秀侠：《华侨名人传》，转引自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9页。

[2]杨慰然：《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新加坡杨氏公会特刊》，1968年，第28页。

商界巨子，任3个公司（新新公司、华洋药行和中南味英厂中美盐酸厂）的经理，任6个公司（国华银行、福安公司、新光内衣厂、冠华呢帽厂、房地产等）的董事长。他经营的房地产公司，有五百多幢楼房供出租。富臣在事业有成、财力雄厚之后，又向汕头发展商业，在德安街有多间店铺，在高陂也有多间店铺。

杨虎臣到上海后从小生意做起，由小到大，后跻身参股于上海的五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福安、大新）中的新新公司、福安公司，还经营华洋大药行。虎臣在上海商场得意，又在汕头经营集成发商店，专门买卖布匹，由其弟礼臣当账房，商务兴隆。

在家乡和国内难以谋到合适职业，即往南洋谋生。往南洋者，不是简单地赚取生活费，而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杨锡禧，百侯楼下青箱世业人，为通议第翰林杨绩绪的五世孙。世以读书为业，但其兄端禧、弟应禧应考不果，且丧旅途，因而视学为畏途。遵照其叔杨春城之嘱，弃儒业商，帮助其叔打理位于潮安县城东堤的“来盛号”生意。“越年，国事已非，认为在家固守无益，当时乡人出洋者众，养猪酿酒，披荆斩棘，备极辛苦。继至新加坡，落脚巴生，养猪酿酒，惨淡经营，披荆斩棘，备极辛苦。继与子其鏊、其乐，更拓地种植橡胶，兼营他业。是以生意日隆，生活益裕……中年后，思乡心切，隔年必回一省视老母林太夫人。”^[1]民国初年，随乡人到新加坡，经营养殖业和种植业，并将妻儿一起接去，经过艰苦创业，终于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下了一份不菲的基业。

再如杨兰芳，为乾隆乙丑科进士翰林院编修讳演时公玄孙，副贡生选授龙川县儒学正堂讳德常公曾孙，出身书香门第，世以业儒为生。但到清末，家道中落，且人丁渐繁，迫于家计，弃儒

[1]《百侯楼下杨氏青箱世业房谱》，手稿，藏楼下杨海澄处。

就商，到南洋谋生。“服贾海邦，远隔重洋。”其子杨捧章年仅十余岁，为继承父业，振兴家业，其母即将他送出家门去学商，并教导他说：

汝尚在童年，何忍远离，第男儿志在四方，营谋伟业，不宜株守家乡，做庸夫俗子之末艺。矧家徒四壁，非自奋勉，何以克振家声。汝学贾于外，当念业精于勤之义，勿事荒嬉。处世接物，时以“诚信”二字，自励可继承先志，慰倚闾之思。^[1]

后捧章在沙撈越经商致富，成为当地有名的商人。致富后的杨捧章热心公益，捐资创办古晋大同大学，并出任旅越埔邑公所、大同学校总理。对家乡则“输财补助原乡族学，以及建公所、开报社种种慈善事业，莫不竭力襄助”。^[2]

（三）分布地区和职业

百侯侨居于外者很多，很自然地，村民为了对侨居于外者进行区分，依照当时大地理的划分，形成了“南北洋”的区分。如1924年杨自修担任筹建族校正总理时，为得到各地侨居者的支持而发的函告名称为《筹建族校干事部致南北洋公函》。所谓“南北洋”，1920年代侨居新加坡等地的杨自修之子杨慰然在《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中说：

我们的原籍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偏僻山区，居民在民初时期海禁已开，分向南、北洋找寻生活。走北洋的以上海为第一站，然后分向苏、杭、楚、川等处，做条丝烟叶或戒烟丸的经营。走南洋的大都先到新加坡，然后

[1]杨自修：《中华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吉日为兰芳又叔婆李太孺人七秩开一荣寿大庆》，《编年录》第7册（手稿），1928年，第34-35页。

[2]杨自修：《中华民国十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吉日为兰芳又叔婆李太孺人七秩开一荣寿大庆》，《编年录》第7册（手稿），1928年，第36页。

分向南洋各岛屿,或为人佣,或经营小贩生意。^[1]

这一概括,基本说明了百侯侨居于外者的地理分布。居于国内者,以上海为中心,分布于苏州、杭州、南京等大中城市,经营百侯土产条丝烟及鸦片烟、百货等。著名的有杨虎臣、杨富臣等。

侨居南洋者,以新加坡为中心,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地,除了新加坡相对集中以外,在其他地方居住的相当分散。职业主要是做工,做生意的不多,很多人在非常偏远的地方当矿工、种橡胶。还有不少人发挥自己在家乡的优势,如侯北、东山、侯南不少人会打铁打铜,到南洋后就自己开打铁店,或在各地的罐头厂做罐头盒,待遇不错。

三、“水客”和侨批:连接家乡与侨居地的桥梁
所谓“水客”,据《辞源》解释,指专门到处采购货物及代人带信送款的商人。清末民初,银行业不发达,同海外几乎没有邮电往来,带钱带物回国需有亲友归国时才能实现。于是有些华侨自愿帮其他华侨带信带物回国^[2],并为华侨带眷属和亲人出国,从中获取一定数额的报酬。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水客,解放后改称“侨批员”,但人们习惯称“水客”。

据调查,近代南洋华侨与家乡百侯之间的沟通方式,有侨批、邮局投递、熟人捎带等,主要以侨批为主。所谓侨批,是指汇集成批寄回国内、以汇款为主的家庭文书。民国时期的侨批有几种情况:一是通过水客到各地侨户收汇收信,再直接带回国内交给侨眷;二是水客收集汇信后,通过当地的侨批局网络邮寄到

[1] 杨慰然:《我所知道爱护族人的族先贤》,《新加坡杨氏公会特刊》,1968年,第28页。

[2] 有的水客并非一开始主观愿意从事此业,而是因为其在南洋做工,但因赚不到钱而想归国,顺便代其同乡或熟悉的华侨带钱物返乡,发现从事此业较他业有利可图而转而为之。



香港或汕头,再从香港或汕头取回汇信分送给侨眷;三是在国外华侨集中的城市的某个固定地点设立侨批馆,专门收集汇信,达到一定数量后再打包打封,通过邮船带到国内的本号或联号(或代理店),再由解批人按地址投送。在潮汕沿海地区,以后一种形式为主,侨批局数量众多,经营规模大,建立起了相当完善的侨批网络和经营体系,陈春声、马明达、邹金盛、杜桂芳等时贤对此有详细的研究和论述^[1],在此不述。而在远离潮汕沿海的大埔客家山村百侯,侨批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国时期水客的活跃相当活跃,侨批以第一、二种形式为主,第三种较少。

(一) 百侯水客

乾嘉以来,大埔往南洋谋生者越来越多。这些侨民多数为贫苦大众,文化水平不高,且居住分散,汇寄信款等极为不便,因此凡亲友回国,托带钱物者颇多。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演变,华侨当中出现了专门在南洋收汇、回国解汇的水客。道光十七年(1837年),高陂张杨泉开始从暹罗收汇回国。至民国时期,大埔县有水客296人,其中川走星马地区的有193人,印尼43人,暹罗22人,安南38人。^[2]

百侯一村,来往于家乡与南洋之间,专门以解送侨批为职业的水客,据调查在民国时期有杨俊明、杨善保、杨公琰等30余人,占了全县水客的1/10以上。其中著名的有杨水泉、杨潮荣、杨娘爱、肖东初、肖娘史等。1949年以后,水客改称为侨批员,仍有杨水泉、肖东初等数十人从事这一行业。除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了东南沿海和南洋外,水客走水一直较为畅通。

水客走水,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从水客的出身而言,百侯

[1]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4期;马明达、黄泽纯:《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暨南学报》2004年1期;杜桂芳:《潮汕侨批》,花城出版社,1999年。

[2] 大埔县金融志编写组:《大埔县金融志》,1989年,第11页。



侯虽有近 40 姓人，几乎每一姓都有在南洋谋生，但水客主要来自杨、肖、肖、丘三姓，丘姓也仅一人，即水客多来自肖、杨两大姓。主要是大姓人多，出洋者多。华侨、侨眷要捎带钱物，多托自己所熟悉之人，而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的叔伯兄弟，而且又是同宗，有发达的宗族组织作为后盾。因而侨胞侨眷更信任本姓，故人数本来就少、侨胞侨眷更少的宗族无疑很难有自己的水客。可见水客与客户之间有着明显的血缘和亲情关系，乡族色彩浓厚。水客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宗族的社会地位和在外谋生的人数多少。

同时水客还要有一定的家业基础，有家有室，有一定的家产，才能使客户感到有信用保证，可以承担所托付的责任。肖东初、杨水泉、杨潮荣等，既是比较成功的水客，同时又是百侯比较富有的人。以大水客杨潮荣为例。他出身于杨姓最有势力的二房，其父在南洋开办橡胶园，自己又于 1917 年 10 月在村口建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海源楼”。该楼成为该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他从事水客业信誉的象征和保证。他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据其后代回忆，主要是他有着非常良好的职业道德，在村民中信誉非常好。他不嫖、不赌、不抽鸦片，并以此作为家规，不允许子孙吃吃喝喝嫖赌，从而在华侨、侨眷心目中树立了“清白家风”的形象。

活动能力强、信誉好的水客，不仅同姓同村的人会托其带钱物，而且外姓外村甚至外地的人也会托其寄带。如肖东初、杨水泉等，曾经营过湖寮人、枫朗人甚至江西人的侨批。

百侯是文化之乡，有文化、口才好、见多识广、善于交际的人很多，只要经营得法，便可获得不菲的收入，同时又可同时关照在家乡和在南洋的亲人，因此从事水客业的人不少。当然，走水也要冒很大的风险。仅汕头与新加坡之间，坐轮船就要七天七

夜，如遇风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在船上因水土不服而病重，就会被扔进海里。侯南大水客杨传教，就是在一次去新加坡的旅途中，因病而被船主扔进海里淹死的。

(二) 经营习俗

百侯在南洋谋生者众多，因而来往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水客非常活跃，一年四季都有人奔走于其间。

水客走水，有大帮、小帮之分。水客内部有行规，大小帮区分严格，不能混走。大帮每年走南洋三次，即四月帮，又称端午节帮，二月出国，四月回国，带回钱物，帮助亲人度过三四月的荒月，同时又逢端午节，故名；八月帮，又称中秋节帮，六月出国，八月回家，所带钱物，赶上家人过中秋节，故名；年帮，九月出国，十二月回乡，所带钱物刚好为家乡亲人过年所需。这些都是赶在家乡人非常看重的三大节之前送到，对于家乡亲人意义重大，故称大帮。

而小帮除错开大帮归来时间外，不拘时间，一年四季都可以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七月帮、九月帮。七月帮刚好赶上七月十五中元节，虽侯南人大部分不过此节，但侯北肖姓村落过此节相当隆重，因此出门在外的侯北人都会由七月帮寄钱回家过节。每年九月，百侯各村要迎惭愧祖师、三山国王等各路神明祈福，祈福还愿，迎神赛会，相当隆重，在南洋的亲人都会托水客带钱回家祈愿。七月帮等各小帮因介于各大帮之间，因而又俗称“帮丫”。

有一种观点认为，水客走水之所以称“帮”，是因为水客们出国时联袂而行，回来时又结伴而回。^[1]其实这可能是误解。在百侯，虽然有水客数十人，而且多是同宗或亲友，相互熟悉，但他们从来不会结伴而行，都是各走各的，各有自己的路线和客

[1] 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户网络。即使到同一地点,也会有意避开,不会碰面。笔者之见,所以有大小帮之分,主要是经营人数的多少、规模大小以及对原乡亲人生活的重要性而言。

(三) 批局及其经营

侨批局又称信批局,先在海外设坐庄收汇,再由国内有联号(代理店)解汇。南洋各地华侨汇款,只要将钱交当地侨批局,他们便通过香港转口汇入国内,内地侨批局(代理店)按汇入款项交给侨眷,手续简单安全,还可避开当地政府的禁汇规定,因而侨批局一出现,就在潮汕沿海地区很快发展起来。^[1]在大埔山区发展也很快,从民国五年高陂同丰号开始兼营暹罗侨批业务以来,至抗战前后,全县经营侨批业务者达27家之多,其中茶阳7家、高陂9家、大麻6家、湖寮2家、百侯2家。^[2]但除民国十三年饶谷士在县城茶阳所开饶兴记批局直接经营与吉隆坡之间的侨批外,其他都是汕头等地侨批局的代理分号,且都是以经商为主,兼营侨批。

百侯设店经营侨批的是杨万成、茂兴光商号。杨万成商号由杨荣轩开办,于民国八年成为梅县人李星海在汕头开设的广泰祥侨批局的一个分号。^[3]广泰祥批局位于汕头育善街29号,开设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是汕头历史较久的批局之一。它经营汕头至新加坡、暹罗之间的侨批,在国内的潮安、高陂、大麻、三河坝、茶阳、百侯、湖寮共设有7个分号,批局把从新加坡、

[1] 邹金盛:《潮帮信批局》,汕头艺苑出版社2001年版;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4期;马明达、黄泽纯:《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暨南学报》2004年1期,等。

[2] 大埔县金融志编写组:《大埔县金融志》,1989年,第14页。

[3] 广东省档案馆藏:《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各批局声请书副份》,全宗号86,目录号1,案卷号344,第192页。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暹罗汇寄来的侨批批解至各地分号,再由分号解送至各侨户,并索取“回批”,寄回批局,转汇款人。

杨万成是由侯南人杨荣轩租杨氏宗族大房的尝店,于民国2年开办的一家京果杂货店,在百侯街上100多间商店中经营有方,规模较大,在当地很有名气,其子杨同伟又做了水客,因而取得了代办侨批的资格,抗战前后由杨光伟接手。但该商号为广泰祥批局代办侨批,并不完全是为了方便百侯侨眷取汇,更主要的目的是充分利用侨批的资金,加快资金和货物的周转。^[1]每当得知有汇款到达汕头后,店东即派人下去支取。但取回来的不是款项,而是以款项采办的货物,再从店中如数支取款项给侨户。店东认为,从汕头提取大量现金回乡,又是水路又是陆路,相当不安全。而把现金变成货物,则相对安全多了,同时又加快了资金的周转,更有利于获利。杨昌明的茂兴光号于1946年开始代理侨批,经营至1955年,也主要是出于同样目的。

正因为如此,不少华侨担心商店资金周转不灵而影响兑款,而频繁来往的水客也能提供安全快捷的服务,相比之下,通过批局直接汇款带信回乡的不多。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批局代办在民国10年就在百侯出现,但一直到1949年,也才发展到2家,而且业务量都不大。因此对于侨批局的经营网络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可能不能估计过高。^[2]

(四) 水客经营侨批:个性化服务

南洋百侯人的侨批很少通过批局,而大多通过水客,除了担心信誉外,主要是因为水客经营是面对面服务,而且流动性大,收汇面广,服务较为周到,能满足客户各种个性化的服务要求。

[1]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4期。

[2] 马明达、黄泽纯:《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暨南学报》,2004年1期。

首先是传递信息。在南洋，他们能深入山巴、矿山、大埠收汇，亲交口信，面达亲情，向各华侨介绍他们急于想了解的家庭现状和要求及家乡变化。在家乡，又能到偏乡僻壤一家一户地送汇，告知侨眷其亲人在南洋的生活、工作情况。他乡闻乡音，见水客如见亲人，这些不是给批局的批信中不多的文字所能代替的，况且华侨尤其是女性侨眷很多都不识字。

其次是带人。家乡与南洋之间，路途遥远，风险很大，非有熟悉路线的人带路不可。新客、侨眷要出南洋，除跟随相熟的老客外，大部分都由水客带路。如由水客杨佛远从马南半岛新山带回的肖娘才给其母亲罗氏的批信（1936年4月10日）中说：“前寄佛远处三十元，男嘱其将（儿子）美南带出以为川资之费，故存放在佛远身边。男现已叮嘱佛远不论如何下帮带美南来外，敢恳大人允男不情之请。”要杨佛远将他年近二十在家无所事事的儿子带到南洋来学艺。杨潮荣每年走水三趟，每次所带新客，少则几人，多则十多人，甚至几十人。到南洋后，他利用自己的人际网络和对当地社会的了解，结合各人的能力和特长，为他们介绍相应的工作。因而由他带出去的人都很感激他，多托他把钱物和口信带回家乡，而家乡人也很放心。尤其是带妇女出洋，很多人在外无法回家完婚，或要妻子儿女出洋，多委托水客带送。

再次是带物。侨眷要给亲人带家乡土特产，如牛肉干、菜干、笋干、豆干、香菇等；华侨在南洋买给家人的物品，如高丽参、洋参、万金油、驱风油等，只有通过水客才能安全快捷地送到。如肖娘才为其母祝寿的寿衣布料，就是由水客肖保甲带回来的。这些都是信批局无法做到的。

另外，不少华侨在相当偏远的地方做工，如马来亚雪南罗、万金等地的山里，远离城市，到批局汇款寄信相当不容易，而水客能够到这些偏僻的地方来上门收钱带信，提供服务。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在早期，水客在收集侨批后，多在当地兑换成可以在国内使用的大洋，直接从南洋带回国内，分发给各侨眷。1920年代以后，随着各地侨批局的纷纷建立和侨批网络的形成，为减轻风险，水客多将所收侨批在当地批局打包，成批寄到汕头，再回到汕头取回，兑给各侨眷。所取报酬，多由华侨和侨眷随意酌给。如果所带侨批和物品很多，则可取得不菲的收入。

水客经营的虽是侨批，但其承载的却是家乡亲人与南洋华侨之间连绵不断的亲情，是海外游子对于故乡的一种感情。因此，在较偏远的客家山村，水客仍是联系家乡与南洋的主要方式，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

四、侨乡社会的建构

（一）建洋房，塑造“洋”味

民国年间，百侯村盖了不少洋楼，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村口的3栋洋楼。进入百侯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栋漂亮的洋楼，楼高3层，一字排开，矗立于村口。3栋洋楼依次为企南楼、海源楼、肇庆堂，虽建筑模式不一样，但均为用“红毛灰”建成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并均建于民国六年。

企南楼由经商上海的杨晋淇所建。其父为清末贡生，曾任福建诏安知县。晋淇弃儒从商，经商于上海，致富后在其先祖杨之徐康熙年间所盖企南轩（1833年被大水冲塌）的基础上，仿仿上海洋楼风格，在家乡盖了企南楼。

肇庆堂为经商汕头的杨荫垣（叔）、峻三（叔）、笃生（侄）3人合资所建。叔侄3人合股在汕头开店做药材生意，经营得法，赚了很多钱。便请江西吉安的建筑师傅，花了3年时间，用了8万多块银元，在家乡盖起了一栋洋楼。因杨荫垣之父字肇庆，故名肇庆堂。在新楼“转火”、乔迁新居那天，恰逢杨荫垣母亲八十一大寿，因而在洋楼内大摆宴席进行庆贺。杨荫垣从潮

汕请来戏班，搭棚唱大戏一周，屋内设宴100台，请全百侯人来吃，并对来往行人施粥施饭三天三夜。这一盛事，成为当时乡间轰动一时的美谈。^[1]

但最显眼的还是海源楼。该楼由村中大水客杨潮荣所建。其父在南洋开办橡胶园，去世后由坤荣、潮荣两兄弟继承。但两兄弟一个在南洋，一个在家乡，坤荣便把家乡的土地交给弟弟经营，而潮荣则把应得的橡胶园交给兄长经营，两兄弟也未分家。潮荣利用这种关系，以哥哥居住地为落脚点，以水客为职业，经常来往于南洋和家乡之间。后以经营水客业所得，于1917年10月建起了中西合璧式的豪华别墅“海源楼”。该楼建筑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共有40余间房。最引人注目的是，除了用西洋色彩浮雕装饰外墙外，在别墅正门三角形的屋顶正面，分别画着一条龙、一只凤，在龙、凤上面是两个裸体女郎手托至顶部的地球。该楼豪华、气派，西洋风味十足，成为该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他从事水客业信誉的象征和保证。

(二) 关爱家乡，举办地方公益事业

接以往的，地方公益多由宗族或庙会组织经营。但到民国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后，地方公益渐成社会公共事务。而地方自治机构，又缺乏足够的资金去经营。随着村外社会阶层的出现，很多公益活动，便由关心桑梓的村外人去经营。

1. 开凿梅子磴

梅潭河起源于福建南靖县，是韩江的三大支流之一，也是百侯连接外界的唯一水道。上可通航至福建平和的长乐、九峰等地，下可至三河、潮州、汕头等地。但梅潭河多石滩，如大洪滩、小洪滩、船路滩、箭滩、大水磴头、滑濼滩、滗灌滩等，行

[1] 杨瑞春：《一座客家大屋背后的故事》，《梅州日报》2003年11月20日。

船相当危险。尤其是位于湖寮水口的梅子磴，“长滩数里，有大小磴、镰子屈（窟）等，大石交织”，上下的船只到此，“上下货物必登岸陆行”。^[1]“由韩江上行之舟楫止于此。”^[2]严重影响响了由百侯至潮州、汕头的通航。开凿巨石，打通航道，成为历代百侯人的梦想。“能浚深清远河道，除去梅子磴之障碍，则百侯必能化僻陋保守之旧习，而投入于竞争之场，可预卜也。”^[3]至民国2年，百侯人杨富臣在上海经商成巨富后，其母邱氏以“百侯阻水”，除“捐巨贖设浮桥、义渡”外，又“以梅潭河道淤塞，亦捐资疏通”。大大便得了百侯人的出行，多年的梦想成为现实，“至今商旅称便”。^[4]对于此事，民国《大埔县志》亦有记载：“旅沪邑人尝捐贖设疏河局，雇匠凿梅子磴。卒以磴之上下地平面高度相距太远，巨石虽去，而滩急如故，轻舟可能渡过。”^[5]虽然航道开通后因水流太急只能行轻舟，但其社会影响不可低估。

2. 救济乡人

清初百侯宗族建构以来，宗族设立尝产、义田等，对贫困困人的生老病死、婚丧等进行救济。尤其在发生灾荒时，以宗族公共产业救助族人尤力。如雍正三年，大埔发生旱灾，族长杨之徐以尝祖进行赈灾。“丙午丁未（1726—1727年），连年米贵，用尝祖煮赈以活族人，更募义助，煮赈以周通乡。迩来念族大丁繁，其间鰥寡孤独穷而无告，以及贫穷之死而无棺槨者甚多，因商族众，拨列祖余祭租谷以贖之。”^[5]民国时期，水旱灾难不

[1] 商焘：《大埔县志》卷1，《地理志·山川》，乾隆九年，第33页。

[2] 无名氏：《论大埔邮政宜推至百侯》，《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3] 杨富臣：《家慈邱太夫人行略》，《杨母邱太夫人六秩寿言》第一册，上海铅印本，1922年，第3页。

[4]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4，《地理志》，1943年，第16页。

[5] 杨又时等：《显考慎斋府君行述》，杨之徐《编年录》下编，《行述附》，1924年，第9页。

断，不时发生鼠疫，加上兵灾人祸，因而乡民死亡相继，生活困苦，宗族难以救助。旅居于外的族人，对于救济乡人起了很大作用。

1923年年底至1924年年初，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许崇智部与陈炯明部在大埔高陂、百侯、湖寮等地多次交锋，且抓丁拉夫，强派军饷，使大埔各地遭受前所未有的“兵灾”，很多村民生活陷入困境。旅居南洋的百侯人得知家乡的困境后，于1924年5月5日，“为原邑兵灾开同乡大会，筹款赈济”。^[1]随后汇回款项，救济村民。

为使救济族人制度化，旅居于外的百侯人还捐款设立了专门的救助基金。如上海富商杨富臣之母邱氏，于1922年六十大寿之日，“捐三千元存借生息，俾乡里贫而无告，为意外缓急之需，藉为纪念”。^[2]

后来村民以这笔款项为基础，成立了专门救助贫民的“贫民社”。并以邱氏为榜样，向旅居于外的村人进行募捐。1926年2月，为筹建族校经常往来于家乡与南洋之间的南洋劝捐员杨自修为此专门撰写了《百侯乡贫民社补助丧葬费捐册序》，全文如下：

人之生也，既有困穷富贵之区分，则有悲哀惨苦之事出，盖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困穷者家无儋石，朝不谋夕，祸患之来，束手无策，其苦况诚有不堪言状者也。我百侯乡人多业少，其中经商致富积有余资者固多，即贫无而告、艰苦谋生者亦复不少。困穷之家，骤遭大故，其丧葬费除求人典鬻外，实无他法。然有求而弗得、鬻而无济者，甚有只身无物、流离死亡者，其惨状为何如耶！因此，有心世道者，莫不惻然怜

[1]杨自修：《编年录》第5册（手稿），1928年，第4页。

[2]杨富臣：《家慈邱太夫人行略》，《杨母邱太夫人六秩寿言》第一册，上海铅印本，1922年，第3页。

悯，思所以助之周济之。夫世界愈文明，则人道愈昭著，同类互助之责任遂因之而愈钜。氏虽女流，稍明大义，本个人之良心，积数十年之怀抱，提议创设贫民社，补助丧葬费，竭其绵薄，先认捐三千元，以为之倡。深望富绅巨贾、慈善士女，慷慨义囊，共襄善举，俾殍殍有资、埋葬有费，不致有死于道路、尸填沟壑，非特殁者感得其所，即生者亦戴德不忘矣。书云：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则斯社之设，当亦为仁人君子所乐与赞助者也。^[1]

由于有旅居于外的族人的救助，村民的困苦境况有所改观。

（三）编印祖先文献，重溯祖宗功德

晚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后，整个传统教育和文化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不再读古诗，做八股文，不再念文言文，而推广白话，从而导致乡村教育和文化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百侯人科举文化传统相当深厚，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积累，成为当时文化人非常敏感的事情。那些出门在外的读书人，为了让子孙牢记祖先在文治武功方面的贡献，自觉地发起了一场挽救传统文献的运动。其中杨氏编印了杨之徐《编年录》《百侯杨氏文萃》，肖氏编印了《椒远堂诗钞》《肖氏族谱》等。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编印《编年录》和《百侯杨氏文萃》。

1. 筹印《编年录》

杨之徐是百侯的名人，康熙二十七年的进士，其传说故事一直在当地兴盛不衰。他在六十岁时，开始整理其一生的经历及编写的主要文章，编成《编年录》，传诸后代。至民国初年，“各房裔孙，均有抄本。顾辗转传写，鲁鱼帝虎，在所不免。前数年

[1]杨自修：《编年录》第8册（手稿），1928年，第26页。

希鸣叔以公手写《编年录》见示，叔姪诸人惧此编之遗失也，拟付割晒，以垂永久。”^[1] 为保存祖先文献，族人决定对其进行编排印刷。但印刷的缘故、费用、编印等问题的商讨却不是在于百侯村里，而是借助邮政通讯，在上海与南洋的族人之间进行的。

发起人是在新加坡的杨理卿。他于1923年函商于在上海百侯同乡会主笔的杨咏琴，提出印刷问题，得到海内外族人的赞同。同时议定，书为赠品，而非为谋利之卖品。但因经费未落实而不果。

印刷地点的选择。当时广州、汕头、上海等地有多家印刷厂，但百侯杨姓人在上海经商的多，尤其是乡中的文化人，不少集中在上海，而且中国的主要印刷书局也在上海，因此决定在上海印刷，由在上海的杨咏琴具体负责。而没有选择距家乡更近的汕头或广州。

1924年2月，在侨居新加坡的杨自修的催促下，杨咏琴经过调查和核算后，对于印刷费用，做了详细的预算：

拟印编年录，现已估计用报纸全大张，三十二开双面印，用五号铅字排印，每面四十六行，每行三十二字，印五百部，每页价洋一元三角二分，如印一千部，每页价洋一元五角二分。底页纸价另算。如印签条，亦另算。此估计印价之大略情形也。

并提出了编印的个人意见。认为要纪念杨之徐，不妨将其像片也放进去。“兄意如果此书要印，不妨将光山公遗像请人拍照，只拍半身小照，做成铜版付印，钉入所印书内，籍作纪念。此项印费及做铜版，亦费有限，不妨与诸同人肩之。”

对于经费问题，他认为个人无能为力，而要在南洋的杨自修等人想办法。“至此项经费，去岁理卿叔来函未曾言明如何筹措，

[1]杨咏琴：《筹印编年录缘起》，载杨之徐：《编年录》附录，1924年，第27页。

弟来信亦未言及。是否由光山公派下子孙认筹此款，抑或另有的款，须详细告，以便进行。”^[1]

对于这件事，族人多有赞同。在安徽的子誉极表赞成，并表示捐款50元。“先大夫之编年录，得诸同志付之割晒，极表赞同，愚名下先认派五十元。”同时还提出希望搜集编印杨氏文集。“再有请者，吾族文化最先，名士不少。请阁下以及诸位能于发起征集先达时豪各种集文，长编短牍，诗联图咏，搜罗成册，殊为有味。至于付印之项，或捐题，或作股亦可。未知诸位以为然否。此等之事，仍祈诸位文豪之士行之。然愚等不文，身居囿匿，又何敢浪谈。间有为吾言者甚夥。”^[2]

印制《编年录》，首先需要有稿本。1924年3月杨自修趁回乡之机亲自在家抄录，同时另一发起人杨慕奚也将抄本寄给上海的杨咏琴。但在杨咏琴互校稿本过程中，发现很多差错。因此写信要求将原本寄来。关于校稿的过程，他在6月11日给杨自修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

编年录本应早行付印，缘弟抄本多错误，慕奚抄本亦有错字差，幸有真本寄来。兄不能不郑重其事，须费数礼拜校勘之光阴，方可付印。否则一经手即排出，再三校对，极形麻烦。故不如先行细细对过，免付印校对，多烦手续也。

同时还与自修讨论纸张、序言和加入赞成人、缘起簿和杨之徐真迹问题：

纸张要好。琮石又言须用连史纸，此事有何难办到，不过看我印费多少，方能着手。如一味盲从，此亦

[1]1914年2月10日杨咏琴给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2]1914年5月1日杨子誉给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兄之不愿为也。瑶阶叔谓‘薄于子孙，厚于外人’，实不免老妪之见解。曾不思我辈子孙不忍听祖宗之手卷湮没起见，乃作为贾利之具，殊非我之初心。今既经议定，亦不必说。琼石函拟加入赘成人，原无不可，然编末如赘成人太多，不知好看否。南洋本支叔侄认派如何，希能作速函知，并将缘起簿即行寄来，俾可编入编末，以清校勘之手续，随后付之手尼，使不致枝枝节节为之。此次印光山公真本篇首序语系光山公手笔，惜残缺不堪，不无负之。如果稍有面目可录者，将此真笔缩做铜版付印，兄实快之。

关于印书局的选定，印制的格式，也是由在上海的乡人依行情决定：

印《编年录》事，本拟向中华定印，因价太昂，不肯逊让，故昨日改向泰东书局定印矣。议定用上等报纸，作三十二开，用四号字，双面排印，再加图点连装本、铜版、封面在内，每页价洋一元二分。全部约计三百余页，分作上下二卷，统计价洋约三百余元。大约九月间即能印就。此间刻已汇出捐款以作付定。仍该之项，须得侄处捐款汇来，方能应付，望速汇收成款，火速汇下，俾可如约履行，切勿延误为要。^[1]

此刻杨自修在南洋新加坡启发学校任教务长，印刷费的定金已由杨惠庐等人在上海捐款支付，而余款的大头则要杨自修在南洋募集。

这次印书由在侨居上海的杨子成和杨惠庐经手，与印刷厂签订合同，议定九月底交书。但因发生江浙战争，印刷厂工人四

[1]杨惠庐1914年7月10日给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孀处。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散。经与印刷厂一再交涉，才于年底印好。致使印得很匆忙，“即校对，吾仅校过一次，因时间仓促也”。^[1]

这次共印1000部，总共印费为380元。但在决算时，杨自修等人所捐之款不够支付，由上海的富商杨绍臣垫付。寄往南洋的巨额邮费因无着落只好改由水客经汕头带往。“在沪及本乡与南洋叔侄认派，据惠庐叔言不过二百余元。印款不足之数，均由绍臣代垫。至寄越寄叻各一百部，子成叔言寄往南洋邮费甚巨，该费一时无人代垫。拟托信客带汕，由汕转托信客带叻照交。为了一时权宜之计，只可照行。”^[2]

书印好后，《编年录》真本在年底交杨祖晏之子毓沪带回百侯，杨慕奚的抄本转交给了其父子誉，事情到此基本结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印刷本《编年录》。

由此可见，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保存祖宗的遗迹事功，使祖德不致湮没，族人自发地参与了印刷杨之徐《编年录》。但在发起、募捐、校勘、善后等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旅居于外的族人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整个事情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2. 编印《百侯杨氏文粹》

旅居在外的族人在编印杨之徐《编年录》的同时，还决定编印整个百侯杨姓人的文献。最先有这个想法的是在上海的杨咏琴。

他在和杨自修商讨编印《编年录》的同时，就提出要把杨之徐儿子杨缵绪的《企南楼诗集》和《佩南斋诗集》也同时排印。同时要求杨自修协助调查乡中文集的存在情况：

[1]杨咏琴1925年3月18日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孀处。

[2]杨咏琴1925年1月6日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孀处。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兄已函达境波兄弟，缘境波兄弟前曾与我言过拟印《企南楼》和《佩南斋诗集》。此次印《编年录》，兄拟将《企南楼》和《佩南斋诗集》一并排入，使我辈上祖著作心血不致泯灭，此亦追远之一法，故函商境波昆弟。如得同意，当再函告。但不卜企南楼尚有文集否？在外沉浮，日已经久，却不妨调查。如文集只有八股，则作罢论。因记得《编年录》中载有乡会试之八股文也。佩南斋如有文集，亦不妨调查，俾易着手。

同时还提出一个更大的愿望——收集整编全杨姓历代祖先的文献：

兄曾有宏愿，能可回家藏拙，将印一种百侯杨氏文献，专汇集族老前辈诗古文词歌赋及作宦之公牍文字，汇成一书，八股文或印多少，聊存一格，名曰百侯杨氏文献录。但不知能可如愿以偿否耶。祇怨劳人草草，未必遂我心。缘此举看似容易，行之实难。族中无公款可以挪动，势必自出印刷经费方易办理。且须我担任校对，或录入付印，或屏而不录，自主有权，免人闲话，取此之故，自愧两袖清风，谈何容易。况近今尚有一二前辈在，搜罗较易，再过数年，老成凋谢，便更难希望矣。前闻卞黼廷先生拟汇集埔邑前辈文字付之剞劂，名为埔邑文献。此书若成，亦称我埔之一好历史也。兄深颺之。^[1]

在安徽的赞誉也有这种想法。他认为百侯杨氏传统以来文化最为发达，但在社会体制变动影响下，族人的文迹日渐淹没乃至消失，因而希望搜集族中先贤平生所著的文章，编成《杨氏文

[1]杨咏琴1924年2月10日给南洋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集》：

再有请者，吾族文化最先，名士不少。请阁下以及诸位能于发起征集先达时豪各种集文，长编短牍，诗联图咏，搜罗成册，殊为有味。至于付印之项，或捐题，或作股亦可。未知诸位以为然否。此等之事，仍祈诸位文豪之士行之。然愚等不文，身居圈匿，又何敢浪谈。间有为吾言者甚夥。^[1]

就他个人所了解看来，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但他谦虚地自认为自己能力有限，而希望由杨自修等人来做。

首先付诸行动的，还是杨咏琴。这次搜集文集活动，首先是由杨咏琴发起，并由在家乡的名秀才杨琼石搜集整理。关于杨咏琴发起的原因和经过，他在序言中是这样表达的：

吾族多积学士，著作等身，稿藏于家，秘不示人，其付之梨枣者甚少。年来新学寔盛，科学昌明，诗古文辞，往往略而不讲。余心惧族先达之文字就淹也。恒思哀其散佚，付诸剞劂，顾有志未逮。尝以此事商之族叔琼石，慨然担任。^[2]

而在家乡的名秀才杨琼石，之所以“慨然担任”，非常畅快地答应，是因为他作为科举时代之人，与前辈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而今时代变革，传统文化完全不讲，甚至要去除，因而也有同样的想法，两个人一拍即合：

吁，当科学昌明、文字退化之会，而欲举族先达所为古文辞者，贞以梨枣传之，其人无几与世蒿柘，徒供覆瓿之用矣乎。顾余不幸生而为今日百侯杨氏之一人，

[1]1924年5月1日杨子誉给杨自修的信。原信存大埔县百侯村杨自修儿媳赖穆媚处。

[2]杨咏琴：《杨氏文革弁言》（民国十五年冬月），《百侯杨氏文革》，1929年。

更不幸世业青箱，迄余身而适丁文运之厄，悼前贤之不
作，惧余绪之就淹，拟取遗文，裒集付梓。奈年来囊
笔，卒卒未遑。今春息影家园，始克检点陈编。^[1]

整个搜集过程从杨琼石于1925年春从南洋回家养病开始。
“今春息影家园，始克检点陈编，网罗散失，得所为古文辞十余
类。厘其谬误，第其先后，凡十阅月而稿成。”“其乐助费用俾
早告成者，厥维蕃史叔之力。而执抄胥之役，旦夕弗辍者，则族
弟慕奚也。”^[2]

但所收集的文稿，并不是全部文人的。“是编对于吾族遗
文，虽经几次搜求，然自明迄清，统计文士不下五百余名，兹之
所辑约居五分之一，其散见他书、流传异地者，当复不少。拟再
广为搜集，赅续付梓。（杨氏文粹编辑大旨）而杨咏琴认为这次
搜集费时十月而“仅得诗文三帙”，其主要原因是“盖代远年淹，
后嗣不克继守先业，或子孙失传，宜其淹没之速也”。^[3]

文集本计划于1925年年底出版，但因资助出版费用的杨虎
臣、富臣“会以他故中辍”，至1929年底才正式出版。

虽为商人，在远离家乡的外地谋生，但对于家乡还是时时记
挂。对他们而言，缩短与家乡的距离，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联系，
不外乎在于拉近与祖先的关系。于是对于维护祖先的行为多极力
资助。尽管时代已发生很大变化，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在当时
看来已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但他们为保留老祖宗的东西，还是在
尽力而为：

吾宗卜居百侯，垂数百年。其间代有文人，凡所载
笔，俱见高雅，惟以后生衣食粟六，坐使筒篇散佚。此

[1]杨琼石：《杨氏文粹叙言》，《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2]杨琼石：《杨氏文粹叙言》，《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3]杨咏琴：《杨氏文萃弁言》（民国十五年冬月），《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不独一族之遗憾，亦一代文献之所系也。比者，吾家琼
石有《杨氏文萃》之辑，甚盛事也。富臣慨解宣囊，以
资刊布。而虎臣以不才，亦得襄助其间。发潜德之幽
光，彰先业之遗绪，留棣遗珠，在所未免。今文粹有
日，乃略述立言本旨如此。虽曰事寻故纸，技学雕虫，
然咀嚼一过，颇有真性情流露其间，在先叶立言之本，
亦无非欲维持正气，舒展天真，与有意为文者，似属有
间，于世道人心，或不无小补。薄海同文，如能匡政，
无以敬帚自珍，凡之可也。^[1]

可见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家族文献，通过祖先文章中的“真性
情流露”，以补“世道人心”，维护天下正气。

作为富商的人们，之所以要资助出版乡人文集，除了道义上
的考虑外，还有更深一层意蕴：

吾百侯杨氏，明清数百年间，彬彬多文学之士。积
稿浩繁，散漫无纪，彰先业而发幽光，网旧闻而昭来
叶，其谁之责也。民国十四年，余攝浙江寿昌县篆，适
宗人琼石倡议发刊《杨氏文萃》，坚请余任其责。余继
思以先德耆献，精神所聚，关系之重，忘其菲薄，爰约
虎臣兄共襄厥事，会以他故中辍。然此心炯炯，未敢一
日忘也。或谓历代艺文志所载书目，类多淹没不见其存
者，亦百无一二传诵于人。六籍近尚倡言废弃，更何有
于晚近之著述，一家之私乘乎？嗚呼，四千年灿烂之
国故，果遂泯灭耶？吾华胄神明之文化，果遂沦亡耶？不
尔，则杨氏先哲灵光所寄，自有其不泯者。是此文萃，
视先代子云之太玄，覆瓿于当世，而昌盛于异代者，其

[1]杨虎臣：《杨氏文萃弁言》，《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2]杨富臣：《序》，《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庶几夫!^[2]

对于传统文化的命运,寄托在未来。而编者杨琼石的更为明显:“吾知是编一出,户诵家传,断不因时代迁流而供人覆瓿也已。”^[1]结果亦果然如此。“《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由族先达汕头集成发店东虎臣氏、族贤达浙江寿昌县令富臣氏出资付印,当时户诵家传,懿与称盛。”^[2]

3. 倡修族谱

杨氏族谱,自乾隆二十六年以陕西按察使致仕归田的十四世杨纘绪编修后,因族大人繁,一直没有再修。至民国年间已200余年,引起了一些族中有识之士的忧虑。“然自十四世迄今,代增八九世,年将二百,族益大,而人事益繁,言修族谱,诚非易事。弟及今不修,恐年代久远,椒蕃瓜瓞,非特至亲视如路人,即乃高曾祖父之名讳、谥号、履历、坟墓,亦将茫然罔觉。言念及此,不禁三叹。”^[3]

杨自修自南洋新加坡归来,担任南洋华侨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取得崇高社会地位的杨自修归乡后,慨然以修族谱为己任。“乙丑秋,余忝充南洋新加坡代表,赴京参与选政。冬竣返省,竟丁父忧。读礼数月,时若敬提议修谱,召集父老兄弟会议于十世祖祠者。再定分房调查,公举稭总其成,余则襄助料理。”^[4]因二百多年没有修谱,很多族人的资料已经遗失。为此,他们认为要修好族谱,首先由各房进行调查,编好房谱,再在此基础上总编成全族的总谱。在杨自修主持下,编修了杨自修所在房的房谱——《百侯渊雅公房谱》,并于民国15年付印。“其中大要,自十五世上溯开其祖,一脉直书,不及旁支者,盖有族谱在也。

[1]杨琼石:《杨氏文粹叙言》,《百侯杨氏文萃》,1929年。

[2]杨天垣:《杨氏文粹序》,《百侯杨氏文萃》,新加坡,1966年。

[3]杨自修:《百侯渊雅公房谱序》,1926年铅印本。

[4]杨自修:《百侯渊雅公房谱序》,1926年铅印本。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然族谱所载,十五、十六、十七三代,略而不详,以下并未记载,是以房谱之修,自十五世以下,依族谱旧例世系,分房填记,烝尝祀业,亦概附人。斯谱也。虽为支中之支,小而又小,然后之续修谱者,得此编而附人,似不无小补云。”^[1]

侯北肖氏自乾隆十六年编修族谱后,虽时有续修之议,但一直没有成功。一直到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出外经商的肖惠南回乡后,在族中老成的责令下,于侯北街头设修谱办事处,动员国内外全体族人参与:

我族修谱之议,前清未叶,族先达迭有提倡。入民国后,族众一再言之,迨民国廿年间,旅外贤达菊魂、千臣诸人,倡议尤力。编纂与经费均有办法。百侯原乡典臣、谨卿、季伟诸叔任,且经开会认款,着手调查。诂人事变迁,忽又中辍,族众为之嗒然。去年冬,惠南自汕回乡,族叔复蜚以修谱为词,且谓事关全族大典,不宜再延,责惠南勉肩其事,语极诚挚。明知绵薄,义不敢辞。于是追随族贤达,拟具章程,筹措经费,推举负责人员。于本年一月一日,在百侯溪北新市场设办事处,着手筹办。旋复加推旅外族贤达有声望者,为董事长及董事,领导一切。现在章程业已修正,并开收经费,着手编纂,分函各处族众,共同赞助。^[1]

整个修谱工作虽由回乡的肖惠南主理,但领导修谱的董事长及董事,却是旅居于外的族人担任,并提供大部分经费。由于主持得力,经费充裕,族谱于当年修成。

(四) 由族学到“侨校”:“文化之乡”的重新塑造

在科举时代,自明末清初以来,百侯科举兴盛,为大埔乃至粤东地区最发达之地。在清末民国废科举、兴学堂过程中,百侯

[1]杨自修:《百侯渊雅公房谱序》,1926年铅印本。

地方经历了怎么样的变迁过程?

1. 早期依靠族产办学之曲折

清末学政改革,废科举,兴学堂,传统私塾教育改为学堂教育。其条件一是师资,二是办学场所,三是教育经费。

为解决师资,推行新式教育,各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纷纷兴办师范学堂,粤东地区比较有名的有丘逢甲创办的岭东同文学堂、黄遵宪创办的东山师范学堂,韩山书院改办为惠潮嘉韩山师范学堂等。大埔县政府于1905年年初在潮州创办了茶阳师范学堂,招收生员等各界文化人为学生。至1906年年底第一届82名毕业生中,百侯籍的有22人,占全县毕业生总数的26.8%。人数位列全县第一,体现了百侯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但在办新学过程中,却历经曲折。

1905年12月3日,惠潮嘉韩山师范学堂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百侯的杨咏琴列为优等,成为百侯杨氏第一个接受近代师范教育的毕业生。满怀怀旧学志的杨咏琴于12月中旬回到家乡后,即提倡筹办族学,“传集老成,会议于延庆堂。经众决议,划定四、五、八三代祖尝各拨一百元,复由各房私尝酌派四百元,为常年经费。先移出二百元为开办费,定办高等小学,附设初等,名曰‘杨氏家族两等小学堂’”,创办了百侯第一所新式学校。学生人数半百,暂借松台书室为校舍。教师由茶阳师范毕业生担任。

虽然开办新式学校名义上得到宗族支持,但作为新生事物,开办之初即遇到很大阻力。“风气未开,办理棘手,冒笑怒骂,比比皆是。”尤其是祖尝为族长把持,拒绝拨款,导致办学相当困难。第二年因经费无着,被迫停办,其原因是:“乃顽劣绅士

[1]《岭东日报》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潮嘉新聞》。

杨升朝、杨锡文等,把持尝款,多方阻挠。”^[1]1908年年初,在师范毕业业生杨琼石、杨自修等与族绅们多次争吵后,族学高小得以借杨氏大宗祠复办,对于复办及与守旧族绅们斗争的过程,参与者杨自修在自己所编《编年录》中有详细记载:

正月二八日,与琼石叔等决议复办高小,公推琼石叔为董事,任筹款;琼石叔、子光叔任教员。三十,上书劝学所总董张龙云(号六士),转详管学官李示谕。二月初六日,与琼石叔赴县谒劝学所,声明族学复办理由。初八日,县专差送到公文、钤记,照会长杨锡文璋。谕尝董杨升朝(椒生)缴交案款,谕族长杨锡文(镜河)、杨晋堃(益堂)竭力襄助。初十日,族老成齐集延庆堂,议办族学。公推余于大宗祠任筹办员。次日余先搬住大宗祠,琼石叔继之。随着人陆续搬校具,并布置一切。时议论纷纷,笑骂之声不绝于耳,甚且欲以强蛮手段加余者,余亦不为动。十三日,揭示开学期。老成辈大以为不然。十五日,行开学礼。下午即上课。族老成集百余人,于三点钟筹议于大宗祠,为抵制也。未几,琼石叔到,邀修出与理论,彼辈理屈词穷,初私避花胎,后潜逃星散。遂依次封尝款。次日,余等即将开学情形上书劝学所,转详管学官。十八日,族老成着人赴县,禀报余等借学营私,被县批斥。子光始入堂任事,堂中學生三十余人,分为高等预科(一年毕业),初等本科(二年级)两班,按照钦章办理,自编乡土土地理、格致课本。瑞廷兄月杪特自县回调和办学风潮,新旧皆否议。三月初三日,老成辈又着人赴县进禀,被管学官李批斥详革等语。嗣是琼谷屡次向收尝款,分文不得。二三日,再将办学理由上书劝学所,转详管学官。

……十二月，奉提学宪批，限十日内清理族学，俾继续办理。胡管学即照会校长暨臣伯（既自京旋）三天办复。于是中立者乃竭力调停，由祖尝内拨出一百二十元，劝琼石、子光作减薪收而了事，族学嗣后由老成办理云。^[1]

由于经费来源取决于掌管族产的族绅，新式教育举办相当不顺利。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志之士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而侯北肖氏因得侨资资助而使族学成功举办，也为杨氏族学的兴办树立了榜样。

侯北肖氏族学在举办之初，也遇到了经费困难问题。但因得在越南经商的富商肖益峰的资助，学校顺利开办：“大埔百侯乡肖绅益峰，具有热心，凡一切关于学界中事，无不慨然乐助。本年春百侯肖君某倡议家族两等小学，苦无经费。该绅欣然捐助二百金，为开办费，家族学堂，赖以成立。”^[2]

因此后来他们在创办新校时，很注意争取侨居于外者的资助。如杨馨甫、俊卿等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创办百侯步梯初级小学校时，每年可得到经商上海的乡人所设基金的“息钱一百元”，占了全部办学经费的1/3。而杨荫垣等于1919年创办百侯锡尔初级小学校时，上海商人杨绍臣竟捐一千元，解决了办学的大部分经费问题。^[3]

2、筹建杨氏高等小学新校

1924年4月1日北京《侨务旬刊》第109期以《华侨关心桑梓教育》为题，登载了广东大埔影园所撰写的一则消息，全文如下：

[1] 杨自修：《编年录》第1册（手稿），1928年，第21-26页。

[2] 《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四日《潮嘉新闻》。

[3] 温廷敬：《大埔县志》卷8，《教育志》，1943年，第24页。

广东大埔百侯杨氏高小筹建新校，前派杨自修君为南洋劝捐专员。该族侨南人士继续请自修君返梓选择校址，磋商进行，详见本刊九六期通信。旋因侯乡迭遭兵燹，自修君乃应南洋砂劳越侨校之聘，复出而长大同学校者一载。后侨南同人得悉潮梅等处故平，桑梓教育之念关切，再请自修君于本年一月遄归，以南洋代表名义，重振旗鼓，召集族众，组织建校董监事会。其分子由南洋、上海、本地各举三人（南洋琼石、潮荣、洲之，上海仰韶、竹史、辉生，本地馨甫、星九、若凡），爰于二月七日开成立会，即组织干事部，公推自修先起草章。次日公同讨论修订，遂按董监事会章选举干事员。开票结果，自修、仰韶为正副总理，星使、庆禧为正副财政，（汕头）集成发（绸缎庄）为外财政。该族南北洋与故乡人士，咸庆得人，新校落成可拭目而俟矣。（自修君素有名于南洋教界，未审能就任该总理否？）

侨居南洋的杨自修，何以深得国内外乡人信任和赞同，被推举为建校董监事会总理，全权领导家乡建校事宜？

杨自修为百侯侯南通议第人，1882年出生于书香之家。1906年毕业于茶阳师范毕业后，立志兴学育才。1906年与茶阳师范的同学一起在家乡任初级小学教员。第二年又再任大宗理事、代理校长。1907—1909年先后任枫朗日新学校教员、校长、湖寮莒村培英两等小学代校长。辛亥革命后，1912年任县立高小教员。1914年出国至新加坡，受聘为启发学校教员。1918年至1919年任檳城大山脚（地名）日新小学校长，1920年至1921年先后任檳城崇德学校校长、日新小学校长。

自创办新式学校以来，各校均以祠堂为校址，没有属于学校的专门办学场所。随着入学人数的增多，办学场所越来越紧张。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1922年1月18日,为解决学童就学困难问题,百侯各界有识之士召开会议,决定筹建杨氏高等小学新校。为解决巨额的建校经费问题,动员海内外乡亲支持办学,家乡父老组建了一个包括南洋、北洋、家乡在内的跨国性的建校董事会,并一致推选教育界德高望重的杨自修出任董事会正总理。身居海外的杨自修先生以桑梓教育事业为重,当年十月代表旅居南洋各埠华侨回国磋商建校事务。

1923年他出任沙撈越大同学校校长,积极出面募捐建校款。校董会择定新校址,决定在榕荫书室背福坛丘得邻近的地方建校(即现在的百侯中学校址),购买建校用地205.51平方丈。旅居南洋各地华侨捐款千余银元,旅居上海的乡贤杨虎臣先生捐300银元。建校喜讯传出,国内外报刊纷纷刊登建校消息,海内外百侯乡人为之振奋。

由于建校工作的需要,杨自修先生毅然辞去优厚待遇的校长职务,专心履行建校董事会正总理的职责。亲自出马奔赴南洋募集建校款,由上海而南洋各埠拜谒乡贤、华侨。在他的推动下,旅居南洋各地华侨欣然响应,认捐白银一万余元。以后数年间,他不辞劳苦辗转于南北洋,为建校而竭尽全力。虽然历经曲折,但终有所获。正如他在1925年12月所撰《南洋劝捐专员报告书》所言:

吾族高小,成于丙午(1906)。廿年来,成绩若何,姑且勿论。辛酉壬戌(1921-22)学生增多,大宗已不能容,执事诸公乃发起建校,中外各报,特载叠登,风声所播,至处皆知。自修迭承委托,荏苒数年,谨将经过事实与捐款,胥列报告,幸垂鉴察。

壬戌民十一,是年自修续长南洋槟榔屿大山脚日新学校。时维孟夏,奉到大札与捐册,委修与瑞廷、子光

·308·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二君为候属劝捐员,即会同磋商,念时艰人少,各为贵取环境所限,嘱修具函告辞,乃族众反以南洋劝捐专员季修。时值暑假,奉读尊札,感愧莫名,窃念致身教育者,侨南无几,不能不趁此时赴叻试办,遂寄寓于刘登鼎君商店,日游说于竹林之门,晚筹策于知交之间,函报交驰,极力运动,始克召集会议,再三演讲,得有头绪,乃与旅叻劝捐员出而沿门劝导,认定两千余元。又赴麻六甲募得两千元,再进淡边田芙蓉而吉隆而巴生而牙岳,复过霹靂入檳榔屿、湾嚕吸,经吉隆而返叻,再往各处,历时三月有余,约捐六千余元。时侨南竹林惟恐空中楼阁,终成泡影,于认捐之际,要求任代表返梓组织筹备处,选举校董,择购校址及建筑一切事宜。修不得已就任,及冬抵家,日与淑之君等,相度地址,计十余所,无奈合式者购难,易购者不合。稽延月余,军队复临。修适奉南洋砂劳越侨校之聘,又别父老兄弟而南行,趁此由叻而甲而岫而雪兰莪等处,报告原乡状况,以清代表手续,然后归越就职,计由暑假至此,费时半年,未见实效,深为抱歉。

甲子民十三,癸亥冬,修奉先严命,辞侨校而返。甲子新正,高小建校董事会告成,续组干事部。修又蒙诸君过爱,被选为正总理,一再告辞,未蒙俯准,不获已暂任而俟。即分函南北洋,催收捐款汇回。二月,与诸同事请吴区长诣福坛坵,复丈量校址,布告办法,招业主到筹备处定价买卖。三月间,迭开会筹商,进行表决,委修赴南北洋募资收捐款。遂于廿八日束装赴沪。四月中旬抵上海,即会同子成伯等,按册收款,或交现金,或立限单,依壬戌认数目,清理收束。五月,由滬

·309·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返梓。六月，复束装南渡，由叻而甲而雪兰莪、霹雳、檳城等处，回叻入越。至九月杪，复返新加坡。统计南洋捐款，实收两千余元，得总数三之一。^[1]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杨自修自担任建校董事会总理后，奔赴于南洋、家乡、北洋之间，拜谒乡人，解决捐款者所提的各种问题，落实新校选址等。

1924年11月21日，建校董事会根据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做出将计划建高等小学改为建中学附设高小的决策。杨自修所募集的海内外捐款，就移作创办百侯中学使用了。但杨自修在募捐建校过程中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所登刊的各种消息，为塑造“侨乡”起了重要作用。

3. 创办“侨校”——百侯中学

百侯中学的创办，与侨居上海的杨德昭及海外侨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德昭之父杨祖晏经商上海，杨德昭（1895—1983年）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学堂，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北伐战争。后从政，任张发奎第一集团军驻南京代表（中将衔）多年，致力于维系国民党与两粤间的关系，以求外患日迫的内部团结。除从政外，杨德昭关心家乡，积极致力于教育事业。

在辍学返乡暂居时，为解决众多小学毕业生无力外出升学之困难，即于1923年与几位在乡的志同道合者办起大埔废除科举后第二间中学——联益中学。后经费无着，一年后停办。1925年秋，他在杨自修等人向南洋、上海乡人所募经费基础上，与乡人杨简史、杨衍祥等人办起了百侯中学。但仅办两年，即受到朱德领导的“八一”起义军影响而停办。

百侯中学停办后，众多家乡子弟在小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

[1] 杨自修：《编年录》第8册（手稿），1928年，第4—9页。

近代粤东移民与“侨乡”的形成和建构

学，引起海内外乡亲的关注。杨德昭在1932年任第一集团军驻南京代表（中将衔）后，即致力于复办百侯中学。1933年刚好是杨德昭之父70岁生日。杨德昭便以将寿礼移作办学经费以庆祝生日为由，请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从而使复办中学之事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所撰《为杨翁祖晏七秩寿庆乞移寿仪充学款启》全文如下：

粤之大埔，位居僻壤，万山环抱，民风淳厚。在昔家礼乐而户诗书，斯文所萃。虽今日世风渐漓，而民情犹存厚朴，古道照人之宿彦，尚若中宵列宿，熠耀人间。如杨君德昭之尊翁，其襟怀行迹，宁非斯文与！翁名绍纓，字祖晏，幼承家学，天资聪颖，明断异于常。儿时值外患环袭，海禁大开，翁悟占咩非丈夫事，乃弃儒冠走沪渎，经营实业，盖动于当时富国强兵之说也。顾翁虽才擅经营，而非沾沾于润身自足之守财贾。以秉性好义，凡为社会公益，或济人之急，斥千金无吝色。纵获盈余，恒于随手散去。人或劝以宜为来日计，翁敬谢曰：“行吾心所安，不能自己。”是以艰苦数十载，未尝有一日丰腴之享，而翁顾怡然也。尝谓杨君曰：“吾不欲以财产贻汝。所能贻汝者，只此为社会为人间之一片热诚耳。”噫，杨君今日之奋励于革命事业，宁非庭训使然耶！翁年齿渐迈，退养里门，居常嗜小饮，与酣辄畅谈乡里中先贤懿行，以相勉励，闻里化之。里巷有勃奚译话，一闻翁至，则摇手面赤，盖恐公知也。其感人之深如此，识者皆谓天之必将赐福于斯人，有子如杨君，是或偿其夙行乎！明岁元旦为翁寿满杖国之年，久闻洪范，五福举寿为首，若翁之生平行事，其享

之也，岂偶然哉！是安可不庆祝，以扬善德而励薄俗？顾杨君虽不胜其显亲之心，然徇于翁，命谓国难方殷，不敢云庆，只冀求有以成父之志而纪久远。继复谨肃陈言，翁方董理复办侯山中学，筹措经费，日夜焦劳。倘承亲友垂爱，愿乞移寿仪而充校费，俾成翁晚年之志，差胜饰一时之虚荣焉。森等既费翁之能贯其行，复嘉杨君为能述其志，不敢徒效祝嘏之词以为翁寿己也，谨书此以为倡。

林森、胡汉民、孙科、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陈可钰、陈济棠 同启（1932年）^[1]

这次庆寿活动共筹得光洋3万多元。杨德昭为此专门设立复办百侯中学基金会，自任董事长，主理复办事宜。

1933年年初，在办学经费落实后，为改变家乡教育的落后状态，杨德昭特邀请在当时创办乡村生活教育很有影响的陶行知帮助复办百侯中学。杨德昭在南京、上海任职期间，曾与陶行知、沈钧儒等人士交往，在经济上资助他们的教育事业。他曾帮助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被陶行知称为“生活教育之友”。^[2]

陶行知由于公务繁忙，不能分身，便推荐晓庄小学部指导员潘一尘到百侯中学任校长。与潘一尘同来的还有南京晓庄师范的优秀教师和学生程今吾等十余人，他们成为复办百侯中学的骨干教师。他们依据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指导思想 and “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实行普通话教学，强调实践，重视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重视发展智力和因材施教，重视培

[1]报刊刊名、登载时间待查明，本文抄件存《杨子源遗书》，现存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杨兆和处。

[2]陶行知：《百侯中学复校十周年纪念》（1943），载《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0页。

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们在百侯中学实行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前后达3年之久。^[1]

在董事长杨德昭的支持下，百侯中学完成了古榕树下的新校建筑，并购买了大批图书仪器和工农业生产工具。同时把乡人原来分房、分姓办的五间小学合并，创办了百侯中心小学，作为百侯中学的附属小学。同时还创办了艺友师范和幼儿园。从而使百侯的乡村教育形成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一条龙”，形成了系统的教育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百侯教育的办学水平，培养出了不少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头脑相长、追求进步的学生。^[2]

陶行知经常和百侯中学保持联系，指导侯中的教育改革工作。生活教育在百侯小学开了花，结了果。

1933年9月潘一尘校长百侯中学后，即按陶行知普及乡村教育的办法，以“即知即传人”为指导，发动中小學生担任乡村教师，推广“小先生制”。结果取得很大成功，中小學生在全乡办了100多所夜校，有学生1000余人，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文化教育的发展。1934年10月，由百侯中学校长潘一尘主编、由陶行知题写书名的《一个南方的普及教育运动》，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其中有76篇是由中小學生写的关于做小先生的经历和体会。

1934年暑假，年仅12岁的百侯中学初二年级学生杨彬跟随潘一尘校长到上海后，以一个偏僻山村穷孩子的特殊视角，写出了一本书——《小先生的游记》。1935年1月，《小先生的游记》由陶行知先生题写书名，在上海儿童出版社出版。该书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大都会贫富对立的社会生活，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

[1]黄久恒：《陶行知与百侯中学的生活教育》，《大埔文史》第12辑，第146页。

[2]杨茂轩：《怀念杨德昭先生》，杨戈：《师颂》，《侯中校友》编委会，2003年，第2页。

[3]杨应彬：《金华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的影响。先后再版过12次，引起社会轰动。^[1]

百侯学生所写两本书的公开发行，极大地提高了百侯乡村教育的社会影响和地位。百侯中学也因此被陶行知看作是“生活教育之友”、“吾道有邻”的一间学校。^[1]

至1942年8月，在百侯中学复办十周年之际，董事长杨德昭以办学已初见成效，海外侨胞要求增办高中为由，向地方当局申请增办高中部：“过去所办，仅为初级中学，而所收容学生，十九为贫寒侨胞子弟。（因大埔粮食短缺，居民多出洋谋生，尤以属校所在地环近为最）彼辈于初中毕业后，欲寻觅职业，则限于学历技能。欲继续升学，则困于家庭经济。缘大埔全县，现仅大埔县立一中有高中之设立，此外则须远求于梅县或饶平。……基于上述原由，故年来地方人士及海外侨胞，纷纷以增办高中部俾能容纳本校及环近初中毕业学生为请。并承海外热心侨胞于去年自动募集十二万三千二百元交由水客带回，作为建筑和设费用。”^[2]并动用私人关系，直接将申请报告送到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结果得到批准。百侯中学由此成为大埔县第一所私立完全中学。

1943年9月25日，在百侯中学复办十周年校庆前夕，陶行知亲自撰写了《百侯中学复校十周年纪念》、《百侯中学校歌》，以志庆祝百侯中学办学之成功。^[3]其歌词曰：

源头活水，逝如梅河。廓岭凌云，无或蹉跎。生辰美吉，树人已多。千灾万难，如琢如磨。金刚坚利，克服凶倭。与国同寿，与民同歌。

[1]陶行知：《百侯中学复校十周年纪念》（1943），载《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0页。

[2]杨德昭：《为增办高中呈教育厅稿》，大埔县档案馆《民国档案》。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92页。

手脑双蔽，未知之门。岁寒松柏，求仁得仁。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努力创造，始败终成。文化为公，百侯精神。

百侯乡村的近代新式教育，从小学而初中、高中、师范，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在侨居于外的乡人的资助和主导下，从精英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一个小山村走向了全国、世界，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之乡”。

四、结语

随着海外贸易的合法化，乾隆以来，尤其是道光年间沿海开埠以后，粤东客家山区居民到台湾、东南亚等地创业，成为向外移民的新趋势。本文根据田野调查和所收集的各种官方与民间文献，以典型侨乡粤东大埔县百侯村为个案，探讨客家侨乡的形成与建构过程。

人多地少、自然灾害、社会动乱，是移民的基本因素，而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则成为出外创业者的主动性选择。至清末民初，全村出外谋生者占总人口的1/3，上海、南京等地被村民视为“北洋”，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被称为“南洋”，数十名“水客”往来其间，百侯成为远近闻名的侨乡。村人倚南洋为“外府”，不仅侨资成为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且侨居者成为建构家乡的决定性力量。他们不仅在家乡建洋房，而且捐资在家乡办新式教育，编修族谱，重印祖先文献，重塑“文化之乡”，建构起“侨乡”的社会形象。家乡的政治、经济、教育、族务等事务决定权，被侨居在外者所控制。伴随着侨乡形成与建构的过程，家乡、“南洋”、“北洋”联成一体，传统乡村事务处理的运作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村落话语权的转移，乡村事务的处理也随之跨越了村界、国界，而具有国际性，从而形成近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很快变质，是因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后，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纷纷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导致乡村社会被劣绅控制。^[1]从百侯的个案来看，传统士绅即使离开家乡到了城市，乃至国外，他们对家乡的关爱、对家乡事务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并没有放弃，继续发挥着传统士绅的影响和作用。

黄宗智在探讨 20 世纪初华北平原的小农经济时，指出由于“不在地主”对乡村的控制与剥削，导致乡村社会经济的“内卷化”而得不到发展。^[2]从百侯的个案来看，外出的乡村精英虽然对村内事务具有控制权，但还是注意与时俱进，尤其是引进一些先进理念促进乡村发展。他们一方面维护传统社会的道德和观念，另一方面又引进海内外新社会的一些积极因素，从而对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建构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百侯侨乡形成与建构的个案，对于比较粤东与粤西侨乡形成与建构的异同，对于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侨乡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

良溪古村与珠玑移民

资料选辑

[1] 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责任编辑：王 晖
封面设计：李柏驹
题 词：秦有朋

ISBN 978-7-5113-1401-7



9 787511 314017 >

定价：42.00元